

#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逻辑

张三元

(武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 武汉 430205)

**摘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走向自觉的“类存在”的表现与确证,因而它必须以人类的自由自觉性为前提。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的自由自觉性,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是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的基本纽带和灵魂。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人类价值共同体。“人的类存在”体现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逻辑。人类走向自觉“类存在”是历史和现实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人类走向自觉“类存在”,因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选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其核心内容或实现路径是共商、共治、共建、共享。

**关键词:** 人的类存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价值; 自由自觉的活动

中图分类号: B8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594(2019)05-0092-06

DOI:10.16354/j.cnki.23-1013/d.2019.05.013

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总书记纵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人类的共同价值”<sup>[1]522</sup>,这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文明共同体,还是价值共同体。人类本来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是在过往历史中一直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存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自觉的,是人类走向自觉“类存在”的表现与确证。这样,作为人类自由自觉的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因而必须在一些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价值共识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是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的基本纽带和灵魂。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人类价值共同体。

## 一、人的类存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在唯物史观中,“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人的类存在”昭示着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客观必然性。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基本思想却在对费尔巴哈哲学抽象人本主义的批判中被遮蔽了。费

尔巴哈把人理解为一种具有“类本质”的存在,认为人的最高本质是“类本质”,但他脱离人的现实关系,把人的类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sup>[2]501</sup>,从而导致对人的抽象化理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人的本质时大量使用“类存在”“类本质”“类生活”“类意识”等概念,并明确指出“人是类存在物”<sup>[2]161</sup>。因此,人们在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常常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一方面强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系统构建奠定了基础,构成了马克思完成“两个转变”、创立新世界观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又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类存在”“类本质”“类生活”“类意识”等提法直接源于费尔巴哈,属于费尔巴哈思想的遗迹,从而予以否定。实际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类本质”的批判,并不是否定人的类本质的存在,而是与费尔巴哈“观念的历史叙述”不同,在“现实的历史叙述”中把握人的类本质。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赋予其独特的、崭新的内涵,为人类走向自觉的“类存在”——“真正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自觉和实践指引。

收稿日期: 2019-06-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价值的跨文化传播”(18AKS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三元(1962—),男,湖北红安人,二级教授,从事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基本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研究。

“人的类存在”具有现实性的根本特点。“人的类存在”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对人类发展及其规律的现实观照。一方面,“人的类存在”是以“现实的人”为基础的。在哲学上,关于“类”的问题,有两条基本的致思路径:一是从抽象的“类”出发去理解“现实的人”;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去理解现实的“人类”。马克思走的是第二条道路即“现实的历史叙述”,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得尤为深刻。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人之所以是现实的,根本在于“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sup>[2]525</sup>。这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sup>[2]162</sup>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个人或人的现实的“生产生活”去理解人的类本质,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人是类存在物”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人的类存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活动、从现实的生产生活出发去理解人的类本质,明确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或者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sup>[2]162-163</sup>。

整体性是“人的类存在”的基本特点。这种整体性也可以理解为统一性或一体性。马克思在谈到“种的类特性”时,把“种的整体特性”与之并列,强调了“人的类存在”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集中体现为共同体,因为“人的真正的本质是人的共同体”<sup>[3]</sup>,而人的共同体是以整体而存在的。共同体都体现为“类”关系,或者说,共同体是关系的集合,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内在统一的整体性关系。就此而言,“人的类存在”的整体性主要通过三个维度展现出来:一是人与人关系的整体性。在横向上,人与人之间构成了一个关系整体;在纵向上,代际之间构成了一个关系整体。二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人以自然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的关系,因而,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三是人与自身关系的整体性。人是一个关系体,是肉体与精神、情感与理智等的对立统一,因而,和谐是其整体性的最高表现。

超越性是“人的类存在”的重要特点。类这个概念既可以用在人身上,也可以用在物身上,但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己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sup>[2]161</sup>因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sup>[2]163</sup>。也就是说,类这一概念用在物和人身上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前者意味着限定性,后者则意味着超越性。“自由的存在物”和“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强调的都是人的超越性:对种的超越、对“人的依赖关系”的超越、对“物的依赖性”的超越、对人自身的超越。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sup>[2]502</sup>“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概念集中而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社会存在这一类本质的理解。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把市民社会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经验事实永恒化,并将其复制成为抽象的一般概念,从而使市民社会的人变成了人的一般或“抽象的人”,市民社会变成了社会的一般。新唯物主义则把真正人的社会——共产主义、真正社会的人类——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立足点,从而开辟了一条人类走向自觉的“类存在”的光明道路。根据这种致思路径,高清海先生认为“‘类’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本性,并且是人完成了本质统一的存在状态。按照马克思揭示的人或社会的三种基本‘形态’,即从群体本位、个体本位走向类本位,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向。”而且,“今日的人类已开始觉醒,走向类化已不再是仅仅属于理论理想的问题,而是已经变成生活现实的客观需求和人们的价值追求”<sup>[4]</sup>。这种观点是符合马克思思想实际的。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正是人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自由状态——自由人联合体,亦即真正的共同体,是自觉的“人的类存在”的实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走向自觉“类存在”的“人间正道”,充分彰显出“人的类存在”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尽管在整体上人类仍然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阶段,离“自由个

性”阶段还有很遥远的距离,自觉的“人的类存在”还是一个理想目标,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却迈出从自发性转向自觉性的关键一步。在这个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马克思“人是类存在物”的价值追求,是“人的类存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深刻展现。

## 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选择

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人类走向自觉的“类存在”,普遍个人的独立性也绝不意味着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在根本上,个人本位并不能完全代表类。经济全球化虽然以个人本位为立足点,但具有从个人本位向类转化的潜力或可能。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全球化是资本逻辑的产物,资本逻辑的价值取向即是它的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因而,经济全球化也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其作用具有二重性,既有“最好的”一面,也有“最坏的”一面。当然,是资本二重性决定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

经济全球化根源于资本本性,是资本逻辑的具体展开,这是马克思一再确认过的历史事实。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过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详细论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等。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通过对资本的历史考察,揭示了资本的本质“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sup>[5]</sup>也就是说,创造剩余价值是资本唯一的、根本的价值目标。这就决定了资本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不断地“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sup>[6]35</sup>。毫无疑问,资本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并导致世界市场形成的历史过程,正是经济全球化本质实现的过程,或者说,世界市场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起点和支点,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市场的全面化和深刻化。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倡导并主导的经济运动,是资本全球性扩张的结果。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有着“最好的”一面,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正能量”是明显而深刻的。其“最好的”一面源于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是资

本“伟大的历史作用”的体现。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有详尽而深刻的论述: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sup>[6]477</sup>但是,经济全球化也有着“最坏的”一面,而且这“最坏的”一面仍在不断演变、加剧,给人类社会造成的“负能量”也是巨大而深刻的。经济全球化“最坏的”一面根源于资本逻辑的邪恶性。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资本是“现代的灾难”<sup>[6]9</sup>的根源。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各种危机与困境归根结底都是由资本的逐利本性造成的。经济全球化既然是资本全球性扩张的结果,也就不可能脱离资本逻辑而独立运行,而是以资本逻辑为原则。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便是“疯狂地发展生产力”,即疯狂地攫取“人的生命力”和“自然的生命力”,其最终结果是导致“人的生命力”的萎缩和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并进而演化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人类生存和发展危机“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sup>[1]538</sup>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吊诡,即民粹主义以及逆全球化思潮从“暗流涌动”到“惊涛拍岸”。之所以用“惊涛拍岸”一词,不仅是因为其来者不善、其势汹汹,还因为其逆历史潮流而动,正在给处于“现代的灾难”中的人类造成新的、更严重的灾难,令人担忧。特别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他以“美国优先”为出发点,祭起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大旗,试图通过“强力执行我们的贸易规则”,甚至以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来“支持外交工作”,不遗余力地保持“美国第一”,并让它一直处于世界“最强大”的地位。这种倒行逆施的霸凌主义行径站在经济全球化的对立面,正在给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设置新的障碍,制造新的不安。当然,“惊涛”只是“拍岸”,不可能“裂岸”,“拍岸”之后,经济全球化必将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前景,但它却提醒我们,在“惊涛拍岸”之际,对其本质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始终保持一种定力,坦然应对,“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虽然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的产生和蔓延有

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资本逐利的贪婪本性。实际上,以“美国优先”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并不是真的要抛弃全球化;恰恰相反,他们是要构造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化,或者说,构造一个由美国随意摆布的全球化。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仍然是深刻而有效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sup>[6]34-36</sup>这就不难理解,曾长期主导世界经济并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美国为何要逆全球化、不断退“群”。经济全球化以资本为核心、实质和灵魂,而资本从来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然而,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其结果并非完全如资本所愿。由于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经济全球化日益呈现出一种新景象: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被以“要素”为界限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所取代,从而引起了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在为资本构筑一个全球化市场的同时,也为原本贫穷落后的国家提供了更多参与国际分工的机遇,使之获得了参与全球化发展的机会,在客观上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以及整个人类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是以经济全球化以及要素分工为背景的。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这与他们倡导经济全球化的愿望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资本通过全球配置获得极大利润的同时,也使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进而引发各种全球性问题或危机,而西方国家基于“个人利益优先”的立场和思维方式,错误地将其归罪于经济全球化,甚至归罪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美国优先”的实质是个人优先,是自由主义的进一步滥殇,当然也是资本“任性”的表现。

从根本上来讲,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产物,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创造出来的,因而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以美国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行径,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面临新的障碍,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但必须承认,经济全球化已行至一个十字

路口,面临新的价值选择。如果经济全球化仍然由资本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所掌控,一味地遵循资本逻辑,只能是将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交由垄断资本的黑金政治随意摆布。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不能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归根结底,这些问题是资本过度逐利、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sup>[1]498</sup>,实现经济全球化从以资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向,确立以人类和平发展为目的的发展方向 and 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归宿,也是人类在对自身生存与发展困境进行深刻反思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彰显出人类走向自觉“类存在”共同价值目标的强烈愿望。

### 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

面对由垄断资本的黑金政治所造成的全球化困境,为给人类文明发展探索一条新路,遵循“人的类存在”发展的必然逻辑,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经济全球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对经济全球化推倒重来,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地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sup>[1]479</sup>,使之成为人类走向自觉“类存在”的阶梯。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人类仍然并将长期处于马克思所讲的“虚假共同体”之中,经济全球化的主体仍然是利益共同体。这就意味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也不可能另起炉灶,但也不是简单地重复“昨日的故事”,而是通过变革把经济全球化引向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变革,主要体现在变革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价值取向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它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和道路。“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sup>[1]524</sup>。这朴素的话语道出了一个极简至深的道理,从而彰显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意蕴,其价值目标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其核心内容或具体路径是共商、共治、共建、共享。

共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其中,共商居于首位。共商是在国家、民族之间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上有事商量着办,没有彼此之间的平等与尊重,就不可能平等地对话,也就不存在共商的问题。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都是平等的,都有自己的

利益和尊严,因而,世界上的事情应该是大家商量着办。但在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主体性遮蔽、僭越、消解甚至取代了人的主体性,资本逻辑成为整个社会的逻辑,在国际关系中亦体现出资本霸权——在政治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垄断资本为开路先锋,以独步天下的军事实力为手段,恃强凌弱、唯我独尊,从而形成不平等的、非对称性的国际关系;在文化上,凭借建立在经济政治实力基础上的文化强势地位,向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强行输入其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等,从而形成一种话语霸权——一切国际事务都是由他们说了算,他们的价值标准就是全世界的价值标准。民主的外衣包裹着独裁的本质。独裁只会制造灾难。可以肯定地说,现今世界的种种乱象都是资本霸权惹的祸。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世界格局正处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和平、发展、进步的阳光足以穿透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sup>[1]522</sup>。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倡导的“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正成为构筑国与国交往新路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共商。一方面,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而是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主权原则;另一方面,要坚持多边主义,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单边主义和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总之,“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sup>[7]274</sup>。

共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求。全球治理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随着世界贸易、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客观上提出全球治理的要求。可以认为,全球性问题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凸显出来的,因而,全球治理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尽管二战以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体系的建立,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目前为止,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相一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了全球治理的主导地位,是全球治理方案的主要供给者。或者说,全球治理是西方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和战略需求而进行的单方面的全球治理,其实质是霸权治理,国家实力是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由于美国超强的国家实力,全球治理实则是美国的霸权治理。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也强调多边制度,但制度本质上是权力的外显或延伸,因此,多边制度有名无实,是以西方霸权或美国霸权为转移的。近几年,美国随意“退群”,动辄制裁甚至开打贸易战,并以武力相威胁,就是对所谓制度治理的绝妙讽刺。事实上,霸权治理或单边治理必然导致经济全球化更加成为资本全球化或美国全球化,具有不平衡性和不公平性的内在特征,不仅使原有的全球性问题得不到解决,还催生出一系列新的、更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实践证明,解决全球性问题只靠霸权治理或单边治理是行不通的。

日益严重而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正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障碍,因此,人类必须有“类存在”意识,以人类整体性力量来应对全球性问题,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开辟新的空间和道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时空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应运而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各个国家看作命运攸关的整体。既然如此,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治理。共同治理需要统筹好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两个方面。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是彼此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基础,没有国家治理就没有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条件,当全球性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时,国家治理也只能是修修补补、舍本逐末,按下葫芦浮起瓢。在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必须有共治意识。一方面,各个国家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国内问题由各国政府和人民自己解决。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主权国家都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解决彼此关心的重大问题,全球性问题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来解决。

共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在一定意义上,共治与共建具有相同的意义,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即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二者目标是一致的,但细加考究,二者还是有差别的,如果说共治强调的是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那么,共建则是在共治基础上共同建设一个新的、美好的共同体。因此,“共建”强调的是建设,即把颠倒的东西“在我们把它颠倒过来之后,在它上面重新进行建设”<sup>[8]</sup>。我们不是要把经济全球化丢弃一旁,而是利用它、建设好它,克服其“极端荒谬”的性质,消解其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从而开辟一条既为本国人民也为世界人民谋福祉的人类文明发展新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样

的一种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哪一个国家所能单独承担并完成的,它需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因此,共建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性内涵和基本路径。

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相对比较抽象的理念,那么,“一带一路”建设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变得具体而实在。“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带,涉及沿线众多国家,因此,“一带一路”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共建”,而“共建”的实质是合作。合作的基础是互信互利。互信互利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到行动上,相互信任、互惠互利。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振兴,这就是我们互信互利的基础,也是合作共建的前提。只有以真诚的态度和行动,才能增进互信、巩固友好,“全面加强务实合作,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sup>[7]289</sup>

“共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位一体”新发展理念中,“共享”居于落脚点和归宿点的地位,也就是说,“共享”是发展的目标。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中,共享同样居于落脚点和归宿点的地位,表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直接价值目标是“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sup>[7]273</sup> 共同发展当然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而具有极为广泛的内容,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一,各个民族、国家共同享受尊严。这涉及国际公平正义的问题。国际公平正义的要义在于,各个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各国人民都有维护国家主权、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别国无权干涉。其二,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共同富裕;相反,贫富差距仍然在不断扩大,世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虽然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西方发达国家获利最大。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压缩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发展空间,是违背国际公平正义原则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主张“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

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sup>[7]273</sup>。其三,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安全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焦点问题。一切全球性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而都属于人类安全的范畴。在“虚假共同体”中,人类安全是通过国家安全体现出来的,或者说,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没有国家安全,就不可能有人类安全,没有人类安全,国家安全也就失去了基本保证。因此,“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sup>[1]541-542</sup>。大家都安全了,世界才能安全,人类才能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总是将其与增加世界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说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价值目标,也是“共享”的本质所在。当然,这里所讲的人,既包括“现实的个人”,也包括“人的类存在”。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作为自觉的“类存在”的确证。在这个意义上,共商、共治、共建、共享展现出一条通往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94.
- [4] 高清海.人类正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1).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9.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

(责任编辑:侯冬梅)